



布尔加科夫魔幻 叙事传统探析

The Magic Narrative: A Bulgakovian Tradition

许志强 葛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魔幻 叙事传统探析

The Magic Narrative: A Bulgakovian Tradition

许志强 葛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尔加科夫魔幻叙事传统探析/许志强,葛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09838-5

I. ①布… II. ①许…②葛… III. ①布尔加科夫(1891~1940)—叙事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9204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2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38-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2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上编 俄国文学史的四种艺术样式	21
第一章 残篇与续篇：“连锁喜剧”的形式功能及其限制	23
(一) 谁是小说主人公?	23
(二) 乞乞科夫或沃兰德：讽刺作家的视角	26
(三) “史诗”及其变体	29
(四) 再论“史诗”及其变体	33
第二章 魔女变形：神话、镜像与“模仿的差异结构”	39
(一) “魔女变形”的艺术样式溯源	39
(二) 别林斯基和舍斯托夫的论断	42
(三) 《维》的作者题注	45
(四) 果戈理如何挪移模仿论界线	47
(五) 玛格丽特的飞翔	50
(六) 《维》与玛格丽特的飞翔	54
第三章 精神分裂：彼得堡的“怪诞讽刺”传统	65
(一) “自然派”的观点	65
(二) 彼得堡的讽喻	71
(三) 巴赫金的诠释	76
(四) 精神分裂与喜剧狂想	80
(五) 《恶魔纪》：传统的新篇章	86
第四章 地下室人：作为边缘人的主体独白叙事	92
(一) 彼得堡“空想现实主义”	92
(二) 关于“地下室人”	98
(三) 边缘人的主体独白叙事	104

下编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神话结构	111
第一章 《浮士德》传统与戏仿	113
(一) 关于诗剧《浮士德》	113
(二) 典故与对应	117
(三) 人物与原型	123
(四) 传统与戏仿	131
第二章 “黑色弥撒”及魔鬼侍从的神话学来源	141
(一) 关于“黑色弥撒”的三种来源	141
(二) 关于魔鬼侍从的考证	150
第三章 “大师小说”对福音书故事的重述	159
(一) 福音书故事的重述或改写	159
(二) “书中之书”的对应关系	164
(三) “大师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	169
(四) 阿夫拉尼的形象和意义	174
(五) “大师小说”的主题及哲理意义	180
参考文献	187

绪 论

—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意识,首先是经由作家本人的定义而变得彰明较著,然后这个定义得到广泛引用,成为解读其思想和美学倾向的一把钥匙。符·维·阿格诺索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论及布尔加科夫的专章,便是引用作家本人致苏联政府的信中所说的话来描述其创作特点,——布尔加科夫的自我定义:“我的讽刺小说表现出的所有其他特点,都是同这第一个特征相联系的,如忧郁的、神秘的色彩(我是一个神秘主义作家),我用它描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数不尽的丑恶;如渗透在我语言中的刻毒,还有对我们这个落后国家中革命进程的深刻怀疑,我惯用伟大的进化同革命过程相抗衡;而最主要的,是要描写我的人民身上那些可怕的特征,正是它们远在革命以前就引起我的老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深深的忧虑。”符·维·阿格诺索夫的著作认为,“这一宣言所昭示的创作原则同果戈理的传统极为相近。……同果戈理一样,布尔加科夫使人面对永恒这一问题,他提出了存在的道德目标问题。20世纪的经验使得这位作家更加深化了老师的思想,坚信忽视道德将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亘古斗争是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一贯主题。”^①

这位富于“忧郁色彩”的“神秘主义作家”,在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眼中只是一名“确有天赋”的文学“丑角”^②,他的名字在巴赫金、纳博科夫等人的晚期著述中从未被提到过,而在莱斯莉·米尔恩看来,他的思想

① 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②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和人品虽已得到同类作家札米亚京、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认可,却还不能算是得到“表扬”^①,如今他已被推崇为果戈理事业无可争议的继承人,“20世纪末最为俄国人挚爱和尊敬的经典作家”,如徐昌汉在其编译的《布尔加科夫散文集》序言中所说,“在国外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报刊上,他的名字高居20世纪俄罗斯文坛榜首”,“有关他创作问题的研究,在俄罗斯、东欧、西欧和北美已经引人注目地成为一门像我国红学一样的‘布尔加科夫学’”^②。作家的一生及其创作历程,在玛瑞埃塔·丘达科娃、帕维尔·波波夫、A. 维利斯等苏联学者的考订研究中,在莱斯莉·米尔恩、艾伦达·普劳弗、科林·赖特等英美学者撰写的长篇评传中已经得到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将近半个世纪来,有关其创作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分析探讨,在前苏联及欧美的布学研究中获得丰富的积累;尤其是关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讨论,单以英语布学研究而言,其专题论文的数量之多,研究之细致,也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布尔加科夫生前的文学活动和他去世之后的文学影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俄国内战、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大约是从1917年到1928年,期间作家弃医从文,在俄苏文坛崭露头角并在莫斯科戏剧界获得成功。然后是作家遭到封杀的斯大林统治时期,作品不能出版,戏剧不得上演,直至1940年作家去世,期间以“抽屉文学”的方式继续创作,作品多半是在小圈子里秘密流传。接下来是“解冻”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作品在西方和苏联国内逐渐公开出版,作家获得世界性声誉,从而得以跻身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巨匠的行列。如果这第三个阶段已经算是结束,那么目前的全球化时期便是第四个阶段的开始。按照莱斯莉·米尔恩的说法,她还不敢确定当今的“布尔加科夫崇拜热”是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也就是说,布尔加科夫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拭目以待。^③从上述的三个阶段看,时代的特定内涵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历程,和他同时代许多诗人作家一样,是与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将来的人们如何来理解这个时代的语言和心态,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未知数,——莱斯莉·米尔恩审慎的总结大概包含着这一层意思。

①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② 布尔加科夫:《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徐昌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译序第3页。

③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能够等同于它的时代性或时代效应,但是文学作品(包括任何文学经典)也都有其特定时代赋予的明暗度和敏感性,包括政治、习俗和流行文化的神经末梢的反应,构成其艺术影响的条件。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读者,对于布尔加科夫作品中广义的政治讽刺(诸如作家协会体制、无神论教条以及住房紧缺等时政问题),其反应和接受也必定不同于欧美读者。东欧和前苏联的诗人作家,像切斯瓦夫·米沃什、米兰·昆德拉、约瑟夫·布罗茨基、诺曼·马内阿等人,虽说他们都追随欧美现代主义艺术原则,创作的想象力具有相对普泛性,但是如果从他们的代表作中抽去冷战意识形态的神经,那么这些作品至少在感性层面上会丧失很多东西。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谈到的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变得富于意义,这种斗争倒未必都像诺曼·马内阿的著作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漫画式的对立,——诗人和独裁者的冲突被马戏团小丑的隐喻所替换,一种有所简化的表态和隐喻,而是取决于艺术自身的合目的性,即艺术作为非政治化、非物化倾向的人工制品的性质,它要求美学和伦理的高度聚焦,从而否决任何形式的拘泥和遮蔽,让语言之光洞彻现实。诚如布尔加科夫在他致苏联政府的信中所暗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因此他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创作遵循果戈理、谢德林的教导,以艺术启蒙的力量抵御混乱的时代潮流,因而无可避免地置身于意识形态冲突的风口浪尖;身为俄国讽刺文学的后裔,他和他的先辈导师一样,以近乎宿命的方式投入这场冲突,并在这种冲突和斗争之中成长起来,获得艺术的聚焦和艺术的灵感高涨。严格说来,认为作家布尔加科夫乃是专制集权的不幸牺牲品,这种看法(已成为许多评传类文章的主导观念)尽管从原则上讲非常正确,实质还是相当片面的。《狗心》的创作意味着文学健全的理智是如何在其所处的时代中获益,或者说是如何在其禁锢的社会现实中获得艺术的冒险和表达;此类创作也只有在与“这一个”时代的化合反应之中才能获得其原创性和表现力。作为俄国讽刺文学的新锐之作,《狗心》的尖酸刻薄、词语调性和绝妙构想都牢牢根植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土壤(普拉东诺夫的《基坑》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想象它在另一个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被创作出来,也不能想象它在自由宽容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温床中被创作出来。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曾遗憾地表示,同时代的苏联读者错过了《大师和玛格丽特》,未能从这部小说中及时获取丰富的思想启迪。这句话也勾勒出作家独特的文学遭遇:他为自身所处的时代创作,而这个时代却不能阅读他的创作;他的生活最终沦为专制集权的牺牲品,没能享有作家正

常的待遇;归根结底,这是由作家自身的选择所决定,或者说是被高于个人利益的文学原则所决定;通过与时代的这场激越竞争和对话,文学的弥赛亚从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中找到其喉舌;因此可以说,这种创作的意义超越作家个人生活的悲剧,自然也不限于历史上已经终结的那个阶段。

二

从文化意识形态角度考察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英美的布学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两个方面,对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创作特点进行综合的分析与回顾。一是“传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价值体系”^①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及表现;二是俄国文学独特的“史诗”叙事意识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延续和反映。总的说来,这两个方面的表现是与传统的文化启蒙和文化记忆相关;它们在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其特定主题、风格样式及体裁的自我规范)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首先谈第一个方面。1966—1967年,《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莫斯科》杂志首次刊载,人们意识到该篇的风格在苏联的文学环境中显得不同寻常。随着《狗心》等作品陆续问世,读者被这些幽默怪诞的篇章所透出的理性之光所吸引,获得深刻的启示和共鸣。这是迟到的荣耀,也是历史的悖谬。作家完整、坚定、成熟的人格力量令人惊讶,他的思维方式似乎不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作家的全部创作是在苏维埃时期完成的,而且生前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以“不合时宜”的身份登上文坛,试图在“新社会”谋求文学事业的辉煌。这个原初的出发点即已包含其职业生涯的悲剧性质。如果说作家确有足够的先见之明,认识到历史会给予他严肃公正的评价,那么他也应该认识到历史首先扮演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角色,戴着一副抑郁不祥的面具,它的背后似乎丧失现实的立足点。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莫斯科纪行的文章中,谈到俄苏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时指出:“或迟或早,随着中产阶级被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碾成齑粉,‘无职业自由作家’肯定会消失。在俄国,这一过程已经完成:知识分子首先是职员,在新闻书报检查、司法、财政等部门工作——但是在俄国,工作就意味着权力。他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知识分子的各种组织中,最突出的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它支持专政的观念,甚至在精神

^①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创造的领域。”^①随着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取得明显优势,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政治上失败,文化界的政治控制日趋严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岌岌可危;它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将遭遇该国历史上最严酷的命运。实际上,布尔加科夫的遭遇并不比同时代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巴别尔、皮里尼亚克等人)更特别或更严酷;他的命运乃是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没有被流放和处决,已纯属幸运。苏珊·桑塔格的文章谈到作家塞尔日的短篇小说《列宁格勒的医院》,认为是对索尔仁尼琴小说的一种预示,其开篇写道:

一九三二年我生活在列宁格勒……那是些黑暗的时期,城市匮乏、农村饥馑的时期,恐怖、秘密杀人、迫害工业经理、工程师、农民、信教者和政权反对者的时期。我属于最后一个类别,这意味着在夜里,甚至在熟睡中,我都从未停止过聆听楼梯的响声,聆听预示着我被捕的踏上楼梯的脚步声。^②

塞尔日小说这种掷地有声的凝练直白的叙述,记录“新经济政策被砍掉手足”之后那种政治恐怖状况,将在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当中找到同路人,而这种叙述的立场和基调不属于布尔加科夫(也不属于伊萨克·巴别尔和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对苏维埃意识形态的质疑,没有超出艺术家的见解范围。至于说作家与文化启蒙传统之间的联系,此类联系在巴赫金的著述、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中也同样延续了下来,不能说是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所独有。那么,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主要是表现在哪里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独特性便是在于他的保守性。作家坚持以鸟瞰的立场、讽喻的艺术以及神秘主义的道德幻想进行创作;他的创作鲜明地维护欧洲及俄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原理,对艺术良知和精神生活的不朽价值予以纯正而坚定的关怀。

这种相当保守的文化自由主义立场,在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之初便已经确立,体现出一种“身负数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精神包袱的有识之士的风格”^③;从这个保守的基点之中诞生的,事实上却是新时代富于原创性的艺术。像长篇小说《白卫军》,尽管作者本人认为写得并不很成功,它的叙述视角、创作母题和梦态抒情风格却已显得弥足珍贵。诗人沃洛申甚至认为,作为处女作它堪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媲美。《白卫军》以

① 转引自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② 转引自苏珊·桑塔格《同时》,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③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及根据《白卫军》改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同情的态度描写被布尔什维克红军打败的敌人，正如1925年《真理报》的一篇评论所说，小说从一个白卫军的视角对1918年基辅发生的事件作了饶有兴趣的描述；它并“没有将白军军官描写成坏人”，而是将他们描写成一群来自于“特殊阶级背景的普通年轻人”。^①对题材的处理方式也渗透着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理智教诲，后者认为要对抗革命的狂热，其方法就是“坚定地把俄国的知识分子写成是俄国最优秀的阶层”，因此作家应当“勇敢地超脱于红军与白军之上”。^②作家在1930年的声明中则说，他是“根据《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将图尔宾一家描绘成知识分子家庭。^③小说以及剧作的道德中心，体现作者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与挚爱；在其变换的视角和迷乱的记忆之中，家庭观念、书籍和音乐、歌剧《浮士德》、拉丁语、古典文化和欧洲史、俄国文学和宗教史，构成动荡画面中恒久不变的秩序和内核。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形态，触犯官方文艺政策及“新社会”的舆论倾向，这一点在布学研究中已经谈得很多。也就是说，对于政治上“不合时宜”的问题谈得很多，对于艺术深层的问题似乎还需补充说明。

作家的文化观念中始终有一个牢固的原则，那就是他对秩序和优质的喜爱。他的小品文和小说戏剧创作都流露这种倾向，这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20世纪初莫斯科现代文化潮流之外。作家对歌剧的偏爱，其戏剧观念中的拟古趣味，与梅耶荷德等人的实验趣味格格不入；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嘲弄歪曲的描写（他不会没有意识到《穿裤子的云》的作者惊人的才气），也反映作家对时尚先锋艺术的态度。布尔加科夫对诗歌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诗歌是一种他难以欣赏的过于复杂的艺术形式。而他的创作蕴含的智力和趣味的精致复杂，还有他对普希金的推崇，与他对诗歌艺术的评价显然是矛盾的。毫无疑问，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诗歌实验，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友人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创作似乎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那种散文作家的自我防御性的评价，也许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白卫军》、《恶魔纪》、《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创作表明，这些作品与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不管有多么深厚，它们和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的区别则还是非常明显的。把布尔加科夫看做是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言人，这一点

① 转引自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② 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③ 转引自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应该没有异议。安德烈·别雷对布尔加科夫的推崇便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布尔加科夫与欧洲现代派文学潮流之间的联系几乎是一个盲区;他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没有这个环节,这个方面他非常不同于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皮里尼亚克等诗人作家。他似乎没有一个当代前沿文化的立足点或横向参照系。同时代俄国作家中他也是更喜欢布宁而不是安德烈·别雷。莱斯莉·米尔恩在评传中说:“《白卫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在各种文化传统激励下而创造出来的人工文化制品。”^①这种创作也预示着布尔加科夫文学的精神坐标系;从《白卫军》到《大师和玛格丽特》,作家在文化传统的精心参照和当代现实的戏剧性模仿之间架设桥梁,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创作体系。文化传统接近于神秘的开放状态与当代现实接近于蛮荒的隔绝状态,两者之间呈现某种奇异的对立和呼应。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事实上这是艺术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仿佛现实已被拉开距离,以某种倒悬的姿态被置于透镜之下,被置于历史、神话、宗教宇宙观等多重认识水平的观察透视之中。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从未涉足于弗洛伊德主题;日常的性意识支配下的现实观及其表现,从来就没有构成其叙事的某种视角。欧洲现代派文艺的惊世骇俗的创作动机,无论其内含的美学意图有多么复杂严肃,似乎也都没有真正渗入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意识。这个方面他和欧洲流行的文艺思潮及哲学心理学观念缺乏关联。以美学结构和创作技巧而论,布尔加科夫和俄国白银时代的艺术探索有密切关系,其故事叙述的“多层次互相嵌入”和“狡黠的拼接”手法纯然是属于现代,与索洛古勃、安德烈耶夫等人的创作有所呼应。^②但是我们看到,与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安德烈·别雷等人相比较,布尔加科夫的个性气质和美学趣味似乎更为古典保守。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未被纳入欧洲现代派观念影响下的布尔加科夫,却不能想象这个作家失去其纵向的文化传统,即彼得大帝之后欧化的俄国。换言之,我们确实也难以想象布尔加科夫成为一名移民作家或流亡白俄,在巴黎小圈子朗读自己的小说或在好莱坞创作剧本,虽说作家确实具有美国式的幽默

①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② 法国布氏研究专家玛丽安娜·古尔(Marianne Gourg)的论著《〈大师和玛格丽特〉:长篇小说及其世界》中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她认为“布尔加科夫的双重处境”及“文化边缘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进程中是非常罕见的,在对过去十年的先锋派的关系上显得明显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布尔加科夫同世纪之交的颓废派和象征主义运动相关。参见梁坤主编:《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8页。

和乐观气质,也并不缺乏欧美现代科技文化及电影艺术的教育;虽说作家在高加索未能跟随白军撤离,其动机在莱斯莉·米尔恩的评传中尚留下诸多可讨论的疑点,而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确曾有过出国移居的打算。作家自视为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传人。他评价普希金是“维护我们俄国作家秩序的指挥官”^①,而他的第一个长篇散文作品《袖口手记》扮演的便是这个“指挥官”的角色。《袖口手记》、《红色皇冠》、《年轻医生手记》等一系列作品表明,转折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和“精神更新”是作家关注的主题;他是在俄国启蒙传统的框架之内进行创作,与这个传统的使命感互为依存,而不是在此之外去寻求新的创作意识以及更富于实验性的写作主题。

布尔加科夫的现代心理剧和神秘主义道德幻想,以高度戏剧性和梦态抒情的形式探讨俄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所有这些出版或上演的作品几乎都引起激烈的反响和争议。这种创作离开了俄国本土是不可思议的。和果戈理一样,作家涉足于戏剧和小说两个领域的探索,试图“颠覆中间形态和狭隘的解释”,使得叙事文学最终走向与陈规俗套和平民趣味对立的范畴,仿佛小说这种较通俗的体裁反映的不是市民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关注,而是要去承载和叙述有关文化意识形态及主体创造性思想的深层次问题。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布尔加科夫,俄国讽刺文学恰恰是在其文化启蒙的形而上学探讨之中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所谓历史的忧郁、精神分裂、罪疚意识、弥赛亚情结、自我进化及救赎的理念,这些深层次问题总是与转折时代的民族心理和道德境况结合在一起,赋予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利哈乔夫的文章指出:“俄罗斯文学一方面在高级的程度上属于直接的说教——精神更新的布道,而另一方面是触及灵魂的质疑、探索,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这些相互关联的倾向——疑惑和说教——从俄罗斯文学存在之日起就是它所固有的并且长期将文学置于国家的对立面。”^②而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存在何以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更加虚无,更具有精神的和形而上的特性,而其存在本身也总是与艺术创作结合得更加密切。艺术创作体现的个性以及对个性的自我评价,离不开俄国启蒙文化独特的历程及其内在的历史意识。布尔加科夫才智勃发的创作及其卓越的艺术个性,其鸟瞰的立场、讽喻的艺术和神秘主义的道德幻想,既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工业文化,也不属于俄苏帝

① 转引自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② 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国的外省文化,它的方言及地理风俗的广袤疆界,而是属于彼得大帝巴洛克式的现代俄国,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自由主义精英文化,是这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启蒙传统的延续、反刍和表达。

必须指出,作家的创作尽管也被视为俄苏“白银时代”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继承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事实上,从其开始之初便是独立发展的。布尔加科夫从来没有加入过俄国世纪之交的美学流派和文学团体。俄国革命之后,几乎还没有作家像他这样明知故犯地使用禁忌的题材进行创作,挑战布尔什维克的道德解释和历史定义。但是如果说作家让这种美学冒险的可能性变得难以承受,那么他最初的意向也许既不是出于政治批评,也不是出于历史的阴暗心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所尝试的,作家要对离奇的、相当动荡的、其实是难以捕捉的现实存在进行理解和描述,即便不能做出充分解释,也要使之纳入语言形象的塑造表现之中。在艺术原创的精神和历史的灾变之间,作家发现了探索的领地。今天我们看做是有连续性的创作历程,便是对这种发现的确立和体现。《致秘密的朋友》、《剧院情史》等自传类作品,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为“无名作家”的神话独立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历史的灾变”正是由对启示和拯救的信仰所形成的(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解释也是如此),那么这种发现的意义确实还不只是在于题材,更重要的是在于对题材的观念性处理。今天我们认为“《大师和玛格丽特》是苏联小说中最不苏联的一部”(芭芭拉·切林斯基语)^①,可也不得不承认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和剧作都是从基本的苏式题材开始,然后进入故事的构想和讲述。他的讲述最终是在历史和神话交织的层面上展开。作家把艺术视为神话,而神话本身成为创作的题材。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系列创作也是源自于叙事学的发明,让传统的文化元素获得叙事的再现。作家利用基督教神话和文学史经典的各种象征编织文本,而那些可以辨识的象征并不是在狭隘的意义上回应各自的来源。利哈乔夫认为,布尔加科夫对历史的重视标志着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历史主义越来越渗透到文学之中”,“文学不再封闭于文学自身,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东西,而是与对现实生动的兴趣交融在一起”。^②这种神话化的历史思维和创作范式的转变,意味着作家首先是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回应“历史的灾变”,让灵界知识和幻想原则逐渐渗入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叶莲娜的祈祷形成

① 梁坤主编:《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② 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

《白卫军》的“第二次神秘高潮”，在此基础上引入“与历史交叉的永恒幻象”，“小说的轴心自此时此地旋转进入永恒状态”。^①《大师和玛格丽特》将历史、幻象和神秘主义表征结为一体，以“书中之书”的结构展示其象征和语义的循环转化，而其全新的创作方式寓含的是一种既有古典又有浪漫的典范文学风格。由于小说是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创作的，批评家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是一种在文化启蒙和文化记忆的遗产中寻求精神结合点的努力，但是，作品的体裁属性和象征寓意，尤其是它所包含的灵界知识和神话学来源，却并没有得到明确透彻的解释。

康斯坦丁·鲁德尼茨基认为，《白卫军》“具有幽默色彩，紧张、嬉闹的幽默特点”；“该作品原则上没有任何结局、任何定论”^②。鲁德尼茨基对滑稽模拟类风格特质的这种概括，也适用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评论。作家谈到自己的剧作《卓伊卡的公寓》时曾定义说，“令人兴奋的紧张场面，意义深远的奇异风格以及罪恶恐怖的素材”，这是他赋予“悲剧性的滑稽轻喜剧”的三个风格要素。^③作为一个通晓范畴的作家，布尔加科夫深知艺术的旨趣是在于打破一切成见和拘泥，让语言之光洞彻现实。这个方面，他的创作所呈现的大无畏和深邃堪为表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本质上难以做出结论性的解释，其滑稽模拟风格渗透着真正的讽喻精神，作家却总是赋予其作品以单纯的主题和道德框架，诸如爱情、荣誉、宽恕等。布尔加科夫小说的这种构想和特点，在莱斯莉·米尔恩的著作中已得到揭示和强调。如果从创作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角度）考察，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这种鲜明的构想和特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

其次，《大师和玛格丽特》与俄国文学独特的“史诗”叙事意识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与“果戈理传统”课题之间的联系。

英美的果戈理研究是细致深入的，但是英美布学研究中，果戈理的影响

①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

② 转引自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③ 同上，第129页。

谈得还不够多。莱斯莉·米尔恩的著作论述《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专章也未谈及果戈理。这两位同是来自小俄罗斯的作家,兼具忧郁的抒情格调、活泼的戏剧才华和诙谐的魔幻意识,他们的创作才智最为接近,甚至创作的演变特点也是颇为相似。果戈理是对布尔加科夫影响最深的作家。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研究不应该脱离“果戈理传统”的美学课题,它包含俄国现代性意识、俄国现代“史诗”体裁特性及俄国讽刺文学怪异风格的混杂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

把长篇小说称之为“长诗”或“史诗”(poema),这个提法来自于果戈理的《死魂灵》。针对批评家的有关指摘,别林斯基曾撰文指出:“果戈理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称为长诗,不是闹着玩的,并且他指的不是喜剧性的长诗。”别林斯基指出《死魂灵》全新的创作特点,其“纯粹民族性”的“幽默”和“讽刺”的现实主义力量,还有“发展到高度抒情性”的诗人的“人道主观性”,把俄国现代小说创作推向一个卓越的高度,而该小说没有被大众接受,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于公众的趣味,倾向于结婚、发财、一帆风顺的大团圆式的“童话”,不能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处理手法”来欣赏,对此别林斯基的文章强调指出,“只有深刻的、强大地发展了的灵魂才能够理会幽默”,“俗众是不懂得、也不爱它的”,而且“在俄罗斯,没有一个诗人遭遇过像果戈理这样古怪的命运:连能够把他的作品背诵如流的人,都不敢把他视为伟大的作家”。^①

别林斯基发表于1842年《祖国纪事》上的文章,第一个阐明《死魂灵》的诗学价值,给予这篇作品以高度评价。他对“俗众”不懂艺术欣赏的看法,与作者在小说中的创作自白遥相呼应。别林斯基的辩护词中还有一句格言:“《死魂灵》要求我们的是研究。”^②这是非常正确的劝告。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致果戈理的信中谈到:“我认为主要困难在于真正领悟史诗这个词的含义,起码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开始谈论《死魂灵》的时候,发现霍米亚科夫和萨玛林同我的看法相同。这是具有透彻静观的古代史诗,自然是现代的和不受拘束的,是我们时代的——但它是古代史诗。”^③这与果戈理秘书巴·瓦·安年科夫的评价比较接近,后者说:“《死魂灵》第一卷中的前几章便在我记忆中留下了特殊的韵味。这同通常对物象进行深刻的静观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平静的、匀称四溢的灵感非常近似。”^④

①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满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86—192页。

② 同上,第191页。

③ 屠格涅夫等著:《回忆果戈理》,蓝英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6页。

④ 同上,第57页。